

王
儉 / 編注

小秀野唱和詩抄



王儉 / 編注

小秀野唱和詩抄

(修訂本)



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



小秀野唱和诗抄

编著:王俭

出版发行: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
香港上水新成路一百二十三号三楼

电话:26706633 传真:26701382

阳泉市正达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字数 82 千字 印张 4

2004 年 8 月初版 2005 年 1 月第二次印制

ISBN962—450—884—4/D · 47597

定价:港币 13.6 元 人民币:13.6 元



王俭 字约如, 1941
年生于平定, 大专毕业。
长期在阳泉从教。撰有
《精选与点拨》、《我的对
应六环节教学法》等论文
六篇。散文有《溪水清且
美》、《艰难玉成两少年》、
《狄仁杰和他的子弟们》
等 50 余篇。著有《名人家
教二百例》、《名人教子三
十六策》、《尚怡王氏族谱
志》、《张穆诗词笺释·张
穆传》、《月斋文集校释》
等。其中《名人教子三十
六策》在国内影响较大。



张 穆



何 绍 基



祁隽藻

再版前言

商朝的箕子所作之《麦秀歌》，其调低而哀，所以向秀作赋说它“叹黍离之悯周兮，悲《麦秀》之殷墟”。

南朝陈后主所作之《后庭花》，其调轻而哀，所以杜牧写诗说它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岸犹唱《后庭花》”。

鸦片战争后的中国，我们祖国未亡，但处于危亡之边缘境地，加上清廷的腐败无能，时事日非。《小秀野唱和》的基调便和前两者不同，它不悲，也不喜，亦庄亦谐，既讲“麦秀”，也讲“三忠”，既讲避世，又讲用于世，显得哀而不伤，含蓄而深沉。诗集中的诗人们像一个个老练的演员，他们觴花吟竹，歌赞“秀野”，其背景置于体现热爱祖国的“三忠祠”之内。抵御外侮，振兴中华，大概应是张穆的用心所在吧。

《小秀野唱和诗抄》初版之后，我立即向众友人赠书。说，它是件珍贵的文献，其画像，其诗文，其碑刻，可

谓奇世之宝。但我的有关说明性文字一定有误，请帮助指正。

承蒙程美瑞、董怀庆二先生指教，这次修订，我改正了许多不妥之处，特别是将书中五六处人名地名的张冠李戴“红着脸”更正了过来。初版前未敢作注之处，经过考证而补加了进去。彦文、彦武又查证了“三忠祠”、“米家灯”、“第七车”、“妙严墩”之所指。这样，使修订本成了一本较为认真负责的本子。

编注者

张穆与《小秀野唱和》

张穆（1805——1849）是清代道光年间的爱国思想家，同时是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，诗人和书法家。

张穆所处的时代，是帝国主义列强使用坚船利炮开始向中国大举入侵的灾难时期。张穆的学术研究主要着眼于边境防卫，侧重于地理研究。早在鸦片战争前一年，他就著有《俄罗斯事补辑》，被阮元大师“叹为天下奇作”。鸦片战争后一年，他著有《延昌地形志》、《水经注表》，并据《永乐大典》画出《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》，送给自己的好友魏源，魏源得以编入《海国图志》。后来，他曾从《永乐大典》中抄出《元朝秘史译文》十五卷，校订成籍，又与徐继畲通信讨论恒河地理等问题，充实自己的著作。

1846年，张穆编撰地理专著《蒙古游牧记》十六卷。论述蒙古的重要性，祁隽藻说得清楚：“蒙古輿地与

中国边塞相接，其部落强弱关系中国盛衰，非若海外荒远之区，可以存而不论也。”（《蒙古游牧记序》）张穆在自序中写道：“本朝新辟之土，东则有吉林、卜魁，西则有金川，卫藏，南则有台湾、澎湖，莫不各有纂述以明封畛而彰盛烈。独内外蒙古，隶版图二百余载而未有专书。钦定《一统志》、《会典》虽亦兼及藩部，而卷帙重大，流传匪易，学古之士沿有懵其方隅，疲于考索，此穆《蒙古游牧记》所为作也。”可见其编纂该书的目的，既为填补学术之空白，也在为建设和保卫边防之适用。

张穆一生虽属未仕之布衣，但他爱国爱民之心之行几乎贯穿其一生。在帝国主义的炮火面前，他为虎门销烟称快，为津门击退英军而叫好，他还直接投书朝廷命官，要求举贤荐能，呼喊抗敌救国。他在1841年作《与祁叔颖枢密书》，建议祁隽藻选贤任能。1843年，道光帝在投降派的怂恿之下，准备重新起用擅割香港的卖国贼琦善，张穆代御史陈庆镛撰写《劾琦善、奕经、文蔚疏》，仗义执言，称“琦善等三人起用为刑赏失措，无以服民”。在

正义舆论的压力之下，道光帝只得收回成命。

早在撰写《俄罗斯事补辑》之年，张穆便开始打出顾炎武这面爱国大旗，大力宣传顾炎武的爱国精神，以唤起朝野的爱国情怀。

据《明史·儒林传》记载，顾炎武，字宁人，初名顾绛，江苏昆山人。其年十四为诸生，耿介绝俗，不与人苟同，唯与同邑归庄友善，相传有“归奇顾怪”之说。其学说主张敛华就实、救弊扶衰。凡国家典制、郡邑掌故、天文、仪象、河漕、兵农之类，莫不穷究原委，考证得失。撰有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、《肇域志》、《易音诗本》、《音唐韵正》、《金石文字记》、《日知录》、《石经考》、《二十一史年表》等书，皆有补于学术世道。

顾炎武生于1613年，初名绛，字宁人，号亭林。南明鲁王起兵时，曾任兵部职方郎中。明亡之后，困受到嗣母王氏以身殉国的教育，敬仰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学生王炎午，于是更名为“炎武”。

顾炎武的嗣母王氏是太学生王述之女，她明大义，

工文辞，善针织，她经常用明代忠臣义士的事迹来教育炎武。1645年，清兵渡江南下，大肆屠杀江南人民。这时，顾炎武的两个弟弟都死于清兵的刀斧之下，生母何氏也被清兵砍断了右臂。不久，嗣母王氏听到常熟城沦陷的消息之后，义愤填膺，决心以绝食殉国，临终时，她给顾炎武留下遗嘱：“我虽妇人，然身受国恩，与国亡，义也。汝勿为异国臣子，则吾可以瞑目于地下。”她又在《弥留书》中告诫儿子：“国事至此，死且嫌迟，死又何惜；唯余惓惓于尔者，不在言而在行，不在学而在品。”鉴于顾炎武的学识与声誉，康熙时诏举顾炎武入博学鸿儒科，荐修《明史》，顾炎武皆推辞不就。顾炎武曾十谒明陵，遍游华北，所到之处，载书自随。1682年，顾炎武年七十，据张穆考证，顾炎武卒于山西曲沃。

顾炎武不仅是一位渊博的学问家，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。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便是顾炎武所讲述的一句名言。

1843年，张穆与何绍基等集资创建顾亭林先生祠，

并著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。苗夔《使黔草序》：“岁癸卯，子贞集同人鸠资创建亭林顾先生祠于城西慈仁寺西隅隙地。岁春秋及先生生日，皆举祀事。余与石舟、子贞每岁咸在余之学私淑亭林，子贞、石舟则皆读亭林之书而仰止行止者也。”《顾亭林先生年谱》中张穆题词说：“本朝学业之盛，亭林先生实牖启之。而洞古今，明治要，学识赅贯，卒亦无能及先生之大者。闻仪征阮相国、桐城胡雒君虔，尝为先生撰次年谱，惜未之见；大兴徐丈松钩稽各书，依年排纂，写有定本，属为厘正。会何太史绍基自金陵来，携有上元车明经守谦所辑谱，互用勘校。车氏差详，盖车本之昆山吴广文映奎，而吴又本之先生嗣子衍生也。徐丈欲更事厘订以出守榆林，未遑，穆乃不自揆度，比而叙文。综两谱之异同，究大贤之本末，世之景行先生者，尚其有考于斯。”

1844年“亭林祠”落成，张穆手撰祭文，与何绍基等人召集在京名流学者举行公祭：“先生生当叔季，业贯汉唐，学堪为王者师，志非以名山老。身甘荒遁，慰九原贞

小秀野唱和诗抄

孝之心；时际云雷，洒六谒园陵之泪……”在同年的阴历五月二十八日，即亭林先生生日，张穆又撰《生日祭文》，再聚学者公祭，并征得咏顾诗文一百余首，集成《小秀野唱和》，自行书写刻石。

1848年阴历十月，《小秀野唱和》刻石告成，立于北京宣武门西“三忠祠”内。张穆为诗集作“跋”，其跋文为：“侠君先生侨居三忠祠，在康熙三十五年丙子，自春徂秋凡八阅月。余既考得故址所在，请寿阳尚书补题《小秀野》额，杏楼太守闻之，喜先迹之未泯，觐雅风之不坠，录寄一时倡和篇什相视。尚书因属余选石庄刻，镌置壁间，复自录旧作系于后，用备乡祠掌故。”

诗集中参与唱和者31人，加上祁隽藻为32人。所题之诗全为七绝。其中一人四首者为20人，祁隽藻在诗跋里所谓“题诗者凡十九人”，是单指“和”诗之人，并未包括“倡”诗者顾侠君和祁隽藻本人。另有一人和二首者11人。诗集排除祁隽藻“自录旧作”之四首绝句，便是人们习惯所指的“102首小秀野唱和诗”。

《小秀野》内含淳朴而秀美之义，诗集中所收录的诗篇充满了诗情画意，以咏叹“小秀野”的景致进而含蓄地咏叹顾炎武的爱国主义精神，从而抒发唱和者的贞忠而纯洁的爱国主义情操。如“移来妙喜须臾事，况有青山似故乡”，说河山皆美，应有新喜；如“可能容易买林泉，种石三年树十年”，说助人为乐，注重育人；如“堪笑生涯同燕子，春深到处好添泥”，说形同燕子，添泥增春；如“若是称是江南景，槛外还须著此君”，说河山皆美，顾君俊伟；如“秀野草堂文酒会，一时名誉沸江东”，说群英聚会，顾君首当文魁。

唱和诗以即景抒情之笔调，给人以启示，给人以希望。如林则徐家乡的张远写道：“陆居非屋水非舟，种得芭蕉等好秋。米贵长安休怅惘，人间犹有望京楼。”顾炎武家乡的吴廷扬写道：“总是蓬庐陋不妨，红尘忒觉异江乡。诗人心眼真奇绝，到处吟哦有草堂。”商丘宋至写道：“小住长安日闭关，吟深不觉旅愁删。推窗偏坐西南望，辨出层层朵朵山。”长洲刘石龄写道：“斜街花市竞清晨，

芍药移来带露新。虽是故园花较早，输它婪尾十分春。”

祁隽藻作结的诗句可谓画龙点睛，催人奋进。如其二：“分得昆山宅畔蕉，软红尘土此中消，定知投辖留宾地，城鼓三严彻永宵。”而真正叫“文晴”生神添色的应是岳端的“生怕梦魂思故国，堂名仍用旧堂名”，也应是蒋仁锡的“草堂就使分南北，只认堂中旧主人”。这里的“故国”与“暑雨阴阴麦秀时”相对应，显得那么巍峨而高大，这里的“堂中旧主人”与“宣武门边寄一枝”相对应，显得那么亲近而可爱，从而使得我们的祖国“嵯峨”、“秀野”，爱国名人之声誉“沸江东”、“满京华”。

张穆是一位“从故纸堆里钻出来，睁眼面对现实的思想家”（戴逸《简明清史》）。他不满清廷的黑暗，甚至看出了封建统治机器已十分腐朽。1848年，他在《海疆善后宜重守令论》中把封建统治机器比喻成人，形象而又尖锐地指出：“譬之于人，五官犹是，手足犹是，而关窍不灵，运动皆滞。是以当极盛之时，而不及四期，已败坏至此。”